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

[英] 凯恩斯 著





2 019 0437 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就 业 利 息 和 货 币 通 论

[英] 凯 恩 斯 著

徐 毓 枬 译

1981年
1月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英〕凯恩斯著

徐毓枬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67

1963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8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217 千

印数 3,900 册

印张 11.5/16 插页 4

(50克纸本)定价：1.9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中译本前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以后除在剑桥大学任教外,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他担任了英国内阁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雷顿森林城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接着又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

凯恩斯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年)、《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货币改革论》(1923年)、《货币论》(1930年)、《劝说集》(1932年)等等。凯恩斯早年是一个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货币理论问题的研究。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经济停滞和出口竞争能力削弱等现象,因此主张政府实行通货管理政策。《货币改革论》、《货币论》这两部著作和《劝说集》中许多篇文章,反映了凯恩斯的这些观点。但凯恩斯的最重要著作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剑桥学派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学”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把《通论》的出版称做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把《通论》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三本同样伟大的著作。^①

凯恩斯和他的《通论》之所以受到重视，决不是偶然的。下面准备分五部分对《通论》一书及其影响进行剖析：（一）《通论》是在什么形势下出版的？它的基本论点是什么？（二）《通论》提出哪些经济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如何影响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三）为了不断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通论》的追随者如何修补凯恩斯学说的所谓“漏洞”？（四）最近十年内，围绕着《通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如何？（五）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传播，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条件下，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五千万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高潮。

三十年代以前，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

^① 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1958年，伦敦，第1页；艾尔提斯：《凯恩斯派传统教义的失败》，《劳埃德银行评论》，1976年10月，第1页。

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在三十年代政治经济危机条件下，由于这种理论被认为既不能解释大规模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又不能为应付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从而不能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了。垄断资产阶级这时迫切需要的，是为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依据的理论，是宣扬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医治”危机和失业，以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通论》在这方面适应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凯恩斯在给英国著名剧作家和改良主义者萧伯纳的信中，声称他的理论能够用来“推翻李嘉图—马克思的理论”。这句话表明了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用心。

《通论》一书宣传哪些基本论点呢？

凯恩斯认为，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所谈的均衡，是根据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前提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通论》之所以命名为“通”论，正因为凯恩斯自称只有他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才是“通常情况下的”就业理论。

为什么“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呢？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这里，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社会就业量被认为是由这种均衡状态决定的。但凯恩斯断言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如果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那就不能达到充分就业。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把这归因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

之预期”这样“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①凯恩斯把总需求说成是消费和投资的总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此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和“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此引起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其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②。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依据，得出了必须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来调节经济，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论断。他声称，三十年代以前流行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因为那样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危机和失业持久和恶化。他的主张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③，“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④。这就是说，凯恩斯建议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措施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提高总需求水平。

凯恩斯鼓吹扩大资产阶级国家权力。他认为“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⑤在《通论》的德文版序言中，他甚至认为他那一套理论“更

① 《通论》，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69页。

③ 同上书，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321页。

⑤ 同上书，第323页。

适合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即更适合于德国法西斯政权下的情况。

凯恩斯在《通论》中“论证”投资量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量实际变动本身大得多。这就是“乘数原理”。他由此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因为根据“乘数原理”，政府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增长。

以上就是《通论》一书的基本观点。显而易见，尽管凯恩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他的这套理论却是庸俗的。

凯恩斯在这里采用的是宏观分析方法，即以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各个总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的对象。但他所分析的“总量”，是不受特定生产关系制约的“总量”，并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不仅如此，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建立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国民收入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论》中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承袭了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部分，即收入决定价值的学说。所谓总价格即国民收入的公式，掩盖了国民收入的真正来源，抹煞了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创造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阶级对抗性，混淆了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界限。

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实际上承袭了十九世纪初年英国著名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学说。首先，它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的阶级性，把剥削者寄生性消费和劳动者生活必需品消费混为一谈。其次，它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真相。事实上，对于人数众多的、收入低于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者来说，哪里谈得上储蓄在收入增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确实是

消费不足的,但这绝对不是由臆造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①;群众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②。

凯恩斯关于投资不足的论断也是错误的。利息率水平并不是受货币数量的影响,而是受借贷资本供求的影响。利息本身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是由产业资本家让渡给货币资本家的。凯恩斯把利息说成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现象,并认为由这种心理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偏高是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这既抹煞了利息的剥削实质,又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和失业的真正原因。至于凯恩斯所谓预期利润率下降引起投资不足的论点,恰恰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期间,企业停产、设备闲置、原料堆积、商品滞销。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减少是危机的结果,而决不是危机的原因。

凯恩斯认为,单纯靠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是不足以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所以他主张依靠政府力量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失业问题。

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投资增加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和就业增加的论断,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立,但由于凯恩斯的论断是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一假定出发的,因此不符合资本主义经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济运动的规律性。实际情况是,从较长时期看,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而新投资往往采用新技术,因此投资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就业量的相对减少。再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实现条件的经常遭到破坏和产品实现过程的经常发生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比例关系,事实上是通过各种困难和波动,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强制地实现的,凯恩斯恰恰回避了这一点,因此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可能顺利无阻地发生凯恩斯所设想的投资增加将引起国民收入和就业成倍增长的“乘数”作用。

(二)

应当指出,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要求政府调节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凯恩斯既不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也不是最早建议采用财政手段来应付经济危机的人。1931年6—7月,凯恩斯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同主张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交换过看法。当时,凯恩斯仍然侧重于依靠中央银行的利息率政策来调节经济,不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①1933年,即《通论》出版前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了“新政”。“新政”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来应付严重的失业问题。“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受罗斯福政府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②1932年,美国十所大学

① 参看戴维兹:《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1971年,依阿华大学出版社,第121—122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51—152页。

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二十四名著名经济学家就已联名向政府建议,主张加强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的调节,包括运用政府资金和实行公共工程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可布·怀纳后来写道: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模式,“我至少早在 1931 年夏天就已利用了,并且我不认为我是从凯恩斯那里得到它的”,“这种思想当时在我们的学院环境中是经常遇见的。”^①凯恩斯虽然在 1934 年 6 月拜访过罗斯福,但这次拜访并未对罗斯福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的作用;罗斯福政府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特格维尔证实了这一点,他把所谓“新政”的实施归功于凯恩斯的影响的说法称做“凯恩斯派的神话”。^②

既然在凯恩斯以前已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应付经济危机,并主张运用财政政策作为反萧条的重要手段,既然在《通论》出版前美国罗斯福政府已在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实施了“新政”,那么《通论》的出版为什么会如此受到重视,并被如此起劲地吹捧呢?为什么凯恩斯的名气和他的学说的影响会超过同时代有类似主张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呢?关键在于凯恩斯首先从经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以及旨在消除这些现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作了“系统的”概括和解释,提出了一套似乎言之成理的“根据”。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样,《通论》一出笼,就被垄断资产阶级看中了,以为有了凯恩斯提供的“理论”解释和建议,陷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就得救了。不

① 怀纳:《关于我在 1936 年对凯恩斯〈通论〉的书评》 载莱卡契曼编:《凯恩斯的〈通论〉:三十年的报道》,1964 年,纽约,第 264 页。

② 特格维尔:《民主主义的罗斯福》,1957 年,花园城,第 374 页。

仅如此，连一些本来怀疑和反对政府调节经济的人，在《通论》的“理论”启示下，也从此转变了立场。汉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原来担心政府干预经济会把经济搞得更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了《通论》之后竟“转变为”凯恩斯的最积极的追随者。

《通论》的出版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视，但并不等于说《通论》中的思想和主张马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行动。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在《通论》中，凯恩斯这样写道：“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①，“从事战争，乃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之唯一正当用途。”^②就在《通论》出版的那一年，即1936年，希特勒政府撕毁了对德国军事限制的条约和协定，进军来因区，陈兵法比边境，并疯狂扩军备战，1938年年初，德国占领了奥地利。欧洲战争风云日紧，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增加军事支出和使国民经济转上军事生产轨道的主张，在英、美等国具有越来越大的现实性。1939年9月，德军大举侵入波兰，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战争的爆发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失业现象很快消失，使停滞的经济迅速转入战时的高涨。经济学界和政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扩充军火生产和进行战争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这样一来，凯恩斯关于调节总需求以应付萧条的主张暂时被搁到一边。

到了1944年，希特勒德国败局已定，看来大战的结束为期不远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削弱了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可以预见战后定将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① 《通论》，第109—110页。

② 同上书，第110页。

的新高潮。怎样使资本主义世界战后维持政治经济稳定的局势？怎样防止三十年代大萧条历史的重演？怎样麻痹革命人民，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凯恩斯那一套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建议受到了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的赞赏，并被广泛采纳为政府未来经济政策的指南。1944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在大战以后将承担维持高就业水平的责任。1945年4月和5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发表文告，宣布它们将以达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美国于1945年提出并于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宣告政府有责任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资产阶级政府大肆宣传自己要着手解决就业问题，试图给人们以一种假象，似乎凯恩斯主义“安排好”一条不必经过革命而达到普遍繁荣的道路了，那么何必选择社会主义呢？

以政府“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为标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通论》出版将近十年之后，凯恩斯的理论终于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包括美国的“新政”在内）往往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显地以某一派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作为经常性的政策被推行着，而且明确地以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理论和建议作为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从这时开始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年称做“凯恩斯时代”。①

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通

① 加尔布雷思：《货币》，1975年，波士顿，第255—256页。

论》中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比较笼统。如何使这些政策建议具体化，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凯恩斯死于1946年。使凯恩斯的理论和建议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并能被有关的政策执行部门所应用，这主要依靠一些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汉森、萨缪尔森、克莱因等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作为政策措施具体应用时，要求有相应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作为前提，因为对总需求的调节必须首先涉及国民收入的核算，然后才能确定“储蓄比例”、“积累率”、“资本生产率”等等，才能使政府决定和选择对策。库兹涅茨本人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却被认为在这方面为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化”出了力。他在当代资产阶级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被认为替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开辟了道路。其实，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理论和方法中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他的出发点是各种货币收入之和等于国民收入，这表明他承袭了20世纪初以来维尔福特·金和穆尔等人的庸俗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传统。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长期萧条和严重失业，因此《通论》的重点放在反萧条方面。这是合乎三十年代实际情况的。但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长期萧条局面已被战时高涨所代替。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持战后经济稳定和防止经济走向停滞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注意的中心。既要以达到“充分就业”作为维持社会安定的政策目标，又要避免通货膨胀率过大而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以汉森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稳定中求发展”的“反经济周期”的主张。他们说：不要害怕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增大，应

当实行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这就是说,要以整个周期内的“经济稳定”作为目标。为此,在萧条时期要设法提高总需求,在经济高涨时期则设法减少总需求,使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的财政预算盈亏互补。

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还认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只“分析”了投资的变动对收入的作用,而为了使资产阶级政府在实行稳定政策时有所谓更可靠的“依据”,提出要以“引致投资学说”和“加速原理”作为“乘数原理”的“补充”。“引致投资”是指由收入或消费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加速原理”是指收入增加或减少的比率对投资变动的影晌。所谓汉森-萨缪尔森模型,即对“乘数”和“加速”的交织作用的“分析”,既考虑一定量的投资引起的收入变动,又考虑收入变动的比率引起的投资的变动,据说这样就可以根据已知的国民收入数字计算出下一期的国民收入,使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按计划调节的轨道了。应当指出,凯恩斯追随者们提出的“引致投资”和“加速原理”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他们抹煞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把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归结为劳动过程,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固有矛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升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而决不是如汉森或萨缪尔森所断言的那样由投资与产量之比的变动决定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大限度利润始终是资本家追加投资的动力,不管收入或消费会有何种程度的增长,除非新投资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否则资本家宁肯利用现有设备并加强其利用率,而不愿轻易追加投资。因此,关于收入或消费增长一定引起投资比例增长的“加速”作用的论证,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条件下是没有实际

意义的。

克莱因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化”的主要贡献，被认为是把凯恩斯的理论列成联立方程式的模型，然后进行估算和预测，供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参考。科学的经济计量方法应当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些以庸俗经济理论作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不仅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各种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在条件的假设、变量的规定和参数的估算等方面充满了主观随意性，从而不可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四十年代以后，通过库兹涅茨、汉森、萨缪尔森、克莱因等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实现了凯恩斯理论的所谓“政策化”：凯恩斯的建议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经常性的“稳定政策”加以运用。一批信奉凯恩斯学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拉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决策机构和需求管理部门。到五十年代后期，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按照“凯恩斯方式”来“管理”经济，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所谓“管理”经济的“凯恩斯方式”是措采取“相机抉择行动”来运用宏观财政政策或宏观货币政策。

宏观财政政策：萧条时期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总需求；高涨时期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总需求；必要时不惜扩大财政赤字，靠国债来弥补。很清楚，宏观财政政策是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剥削以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指增加政府订货和扩大军事支出，使垄断企业直接受惠；减少财政支出主要指减少非军事方面的费用和紧缩公共服务部门支出，广大劳动人民是受害者。增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劳动人民身上，而减税的最大受